

(美) 费正清 费维恺 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4837 4

剑桥中国史

6.156/13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下

〔美〕费正清 费维恺 编
 刘敬坤 叶宗敷 曾景忠 译
 李宝鸿 周祖羲 丁于廉
 谢亮生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 梁 琛

责任校对: 石 久

封面设计: 式 一

版式设计: 李 勤

制 图: 诚 实

剑桥中国史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JIANQIAO ZHONGHUA MINGUO SHI

1912—1949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9.75 印张 2 插页 1 折页 1036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04-1406-4/K·204 定价: 31.00 元

数字
知识
船
PDG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中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 and 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敷初校了全书(除去第2章);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1、第3、第7、第14章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1章 刘敬坤

第2章 高士华

第3章 李宝鸿

第4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5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6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7章 丁于廉

第8章 高士华、董卉

第9章 范磊

-
- 第 10 章 周祖羲
第 11 章 曾景忠
第 12 章 第 I 部分 汪朝光；第 II、III 部分 李学通
第 13 章 马晓光
第 14 章 叶宗敬
地 图 张 言

总 编 辑 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到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和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

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目 录

总编辑序 (1)

第 1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作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玛丽·B. 兰金
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费正清 安阿伯,
密执安大学历史教授费维恺)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5)
中国统济的增长和变革 (13)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33)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57)

第 2 章 1911—1931 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作者:东京,青山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卫藤沈吉)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87)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96)
日本的二十一条 (107)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17)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120)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125)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128)

第 3 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 年

(作者: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历史教授易劳逸)

权力初步巩固 (134)

各省的斗争	(142)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147)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152)
国民党诸派系	(160)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167)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181)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185)

第4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作者: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教授陈志让)

党的重建和领导	(189)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207)
寻找一种战略	(225)
苏区的毁灭	(232)
“白区”的地下工作	(246)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250)

第5章 土地制度

(作者:帕洛阿尔托,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研究所马若孟)

土地制度的状况	(264)
农业的商业化	(285)
农业危机	(292)

第6章 农民运动

(作者: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教授

吕西安·比昂科[珍妮特·劳埃德译])

自发的抗租抗税	(313)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329)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349)

第7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和东亚语言文明教授孔斐力)

社会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376)
区域政体	(387)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391)
乡村建设运动	(400)

第8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孙任以都)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年	(411)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439)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469)

第9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作者: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

30年代文学,1927—1937年	(478)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486)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505)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532)
延安座谈会	(543)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556)

第10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作者: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入江昭)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563)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571)
国际主义的瓦解	(577)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582)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59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605)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615)

第 11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作者:易劳逸)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623)
中国的战争动员	(634)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644)
外国军事援助	(657)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662)
通货膨胀灾难	(666)
工业部门	(676)
政治上的虚弱	(687)

第 12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 年

(作者: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莱曼·范斯莱克)

I. 战争初期,1937—1938年	(698)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699)
军事战略与战术	(702)
领袖与领导权	(704)
组织机构与活动	(709)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717)
根据地的建立	(723)
II. 战争中期,1937—1943年	(752)
与国民党的“磨擦”	(753)
新四军事变	(760)
日本的强化治安	(764)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780)
III. 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年	(805)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806)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809)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813)
第七次代表大会	(818)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821)
瞻望	(823)

第 13 章 1945—1949 年的国共冲突

(作者:香港,大学服务中心苏珊娜·佩珀)

谈判与美国的卷入	(825)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841)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856)
1946—1949 年的内战	(863)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890)

第 14 章 1949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作者: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政治学教授宣道华)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 年	(899)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 年	(931)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 年	(953)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 年	(981)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989)
书目提要	(995)
书目	(1040)

第 1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泛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

^①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意见。

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来。例如，第12卷第1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10、11和12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白莲教，1796—1804年；太平天国，1850—1864年；捻军，1853—1868年；回民，1855—1873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1839—1842年；英法，1856—1860年；法国，1883—

1885年；日本，1894—1895年；1900年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20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度的1911年的共和革命*，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1966—1976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19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5000万人（现在为1亿人）甚至在1937—1945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10亿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

* 即辛亥革命。——译者。

两个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1800年到1949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 国家间适者生存的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总体革命，如法国在1789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1789年与1797年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费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2版，第126页。